

第五章

中國文化創新的參照系統（Ⅱ）： 徐復觀對日本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評論

一、引言

在徐復觀思考中國文化的創新時，日本文化是他的另一個參照系統。徐復觀一生與日本頗有關係，早歲（1930-1931，26-27歲）留學日本，初入明治大學學習經濟，後轉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民國二十（1931）年中日之間爆發九一八事變，徐復觀因抗議日本侵華被捕入獄退學而返國。戰後在1950年、1951年（3月至9月）¹及1960（4月至7月），徐復觀又重訪日本，撰寫甚多對日本各方面之評論文字，廣泛涉及日本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問題。在當代儒家思想人物中，徐復觀確有其特殊性。

我想採取兩個角度分析徐復觀對日本政治與文化之評論：首先探討徐復觀的儒家思想立場，如何影響他對日本的評論。接著再將徐復觀對日本的評論，與當時媒體中的相關評論加以比較，為徐復觀的言論進行歷史定位。本章第二節首先回顧二十世紀初年中日之間的思想交涉，以及青年徐復

¹ 徐復觀1950年赴日是為觀光，1951年則以記者身份赴日，他說：「民國四十年三月到九月，曾以華僑日報駐東京特派員名義，住在東京並以司〔傑按：「司」應為「斯」之筆誤〕托噶的筆名為該報寫了若干通訊。」見徐復觀：〈從平劇與歌舞伎看中日兩國民族性〉，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頁267-270，引文見頁267。

觀留學日本的歷史背景；第三節探討徐復觀對戰後日本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評論，並分析他的評論意見中所潛藏的思想立場；第四節則將徐復觀對日本的評論意見，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加以衡量，並取之與同時間內臺灣的報刊意見互作比較，以彰顯徐復觀思想的特殊性。第五節則綜合本章論點，提出結論性的看法。

二、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日本

近百年來中日之間關係錯綜複雜，日本既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西方文化之啟蒙者，又是軍事侵略者，兩者之恩怨情仇，一言實不足以盡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對日本的態度之轉變，當開始於公元 1895 年中日甲午之戰。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起首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²誠為歷史之實情。其實，早在甲午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康有為（南海，1858-1927）在光緒 21 年閏 5 月初 8（1895 年 6 月 30 日）就上書光緒皇帝，對「日本蕞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之十一。近者其國王與其相三条實美改其政，國富日強，乃能滅我琉球，割我遼臺」，³深受震撼，力主變法之必要性。誠如李國祁所指出，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的仇日情緒頗為高漲，但是戰後則豔羨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轉而師法日

²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年 2 月臺 2 版），頁 1。

³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年），第二冊，頁 179。

本，使中國在近代化的努力上出現了一個以日本為模仿對象的時期。⁴

正是在甲午戰後中國從仇日轉變為師日的時代氛圍中，張之洞（1837-1909）送兒子赴日本留學，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⁵梁啟超應臺灣當時的大地主與抗日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1881-1956）的邀請，在1911年2月24日，和他的女兒梁令嫻從日本神戶出發，搭乘「笠戶丸」輪船來臺灣訪問，梁任公在行前給友人信中說：「吾茲行之動機，實源頻年居此讀其新聞雜誌，咸稱其治臺成績，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謂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⁶任公對日本人之成就不勝其好奇之心。也正是在這種以日為師的歷史背景之下，國民黨人戴傳賢（季陶，1891-1949）在1928年出版《日本論》，極力主張：「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⁷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之下，大量中國留學生湧向日本。據實藤惠秀的研究，在1904年中國留日學生已在八千至一萬名之間，到1906

⁴ 李國祁：〈清末國人對甲午戰爭及日本的想法〉，收入《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1994年），頁641-674。關於近代中國從輕視日本到重視日本的轉變，參看王曉秋（翻譯：王雪萍）：〈近代における中国人の日本観の変遷〉，收入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編集：《中國人の日本研究-相互理解のための思索と実践》（東京：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セソタ，2009年），頁113-132。

⁵ 張之洞：〈致兒子書〉，收入李家慶主編：《教育古文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頁178。

⁶ 梁啟超：〈遊臺灣書牘第一信〉，收入氏著：《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卷4，頁14。

⁷ 戴季陶：《日本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年），頁3。

年則高達一萬三四千或二萬名之譜。⁸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與日本關係深刻者甚多，例如史學大師陳寅恪（1890-1969）在1902至1904年（十三-十四歲）以及1904年10月至1905年（十五-十六歲）時，就肄業於日本新文學院中學。陳寅恪長兄衡恪、二兄隆恪也都留學日本。⁹曾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子民，1868-1940）年輕時雖未赴日留學，但在光緒24（1898）年廿四歲時與友人合組東文學社研讀日本書籍以吸收新知。儒學大師馬一浮（1883-1967），在光緒30（1904）年二十二歲時，也從美國轉赴日本留學半年（1904年5月-11月），在日本結識馬君武（1881-1940）及謝無量（1884-1964）等人。在為數眾多的中國留日學生之中，龍蛇雜居牛驥同皂的情形在所難免。¹⁰

⁸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23。

⁹ 池田溫：〈陳寅恪先生與日本〉，收入《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15-138。

¹⁰ 齊世英（1899-1987）曾回憶二十世紀初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狀況說：「民國五年九月初，我到日本，二哥就把奉天在日本的留學生的情形告訴我，他說留日學生大概分兩種類型：一是入私立大學，繳費即可入學，三年定給文憑，以留日學生名分歸國，一般人哪曉得什麼私立、官立，找事容易，賺錢也多，社會地位也有，然事實上這些人很少上學聽課，常是幾個同鄉一起玩玩、聊聊天、吃吃館子，很多到畢業時連起碼的日語都不懂，高崇民就是屬於這類型。另一種是準備入官費學校的，也許考兩、三年考不上，甚至還有考三次考不上，不能再待下去，只好歸國而遭人輕視的，這當然是一條很艱苦的路。」見沈雲龍等訪問，林忠勝記錄：《齊世英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13-14。關於清末以來中國留日學生的一般性研究，除了前引實藤惠秀的專書之外，尚有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最新的著作有以下兩種：嚴安生：《日本留學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岡田英弘：《現代中國と日本》（東京：新書館，

在二十世紀以降中國知識份子留學日本的時代浪潮之下，徐復觀也在民國 19（1930）年（時年二十六歲），獲得湖南清鄉會辦陶子欽¹¹與胡今予資助赴日留學，赴明治大學攻讀經濟，潛心研究日本思想家河上肇（1879-1946）的著作，思想視野頓然開展。後來因恐得不到學費挹注，經東京青年會總幹事馬伯援的協助，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23期）就讀。¹²徐復觀在五十七歲時，於 1959 年 12 月曾這樣回憶他早年留學日本的讀書生活：¹³

從民國十六年起，開始由孫中山先生而知道馬克斯、恩格斯、唯物論等等。以後到日本，不是這一方面的書便看不起勁，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時候，組織了一個「群不讀書會」，專門看這類的書，大約一直到德波林被清算為止。其中包括了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連日譯的《在馬克斯主義之旗下》的蘇聯刊物，也一期不漏的買來看。回國後在軍隊服務，對於

1998 年）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也有討論（頁 267-295）。

¹¹ 徐復觀曾回憶與陶子欽相識的經過說：「革命軍佔領了整個湖北，並在地方展開整個猛烈地黨務活動後，我在家鄉找不到飯吃，便經九江到德安投奔和我家鄉相距只有三華里的陶子欽先生。他在民國十二年十月前後，背著包袱往廣西投效時，我正在浠水縣城模範小學當教員，曾邀他到我們學校住了一晚。我到德安時，他因打孫傳芳的戰功剛昇第七軍的旅長，把我派到一個部隊中當中尉書記，並送我一部三民主義，我開始想到了政治問題。」見徐復觀：〈垃圾箱外〉，收入《徐復觀雜文（四）·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年），頁 23-24，引文見頁 23。

¹² 曹永洋編：〈徐復觀先生年譜〉，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 年），頁 426-432，民國十九年條見頁 427。

¹³ 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年），頁 311-319，引文見頁 314。

這一套，雖然口裡不說，筆下不寫，但一直到民國二十九年前後，它實在填補了我從青年到壯年的一段精神上的空虛。大概從民國三十一年到三十七年，我以「由救國民黨來救中國」的呆想，接替了過去馬恩主義在我精神中所佔的位置。

由此可見，徐復觀早歲留日為時雖短，但是這一段留學經驗卻為他的思想留下了可觀的痕跡。徐復觀留學日本的前後幾年間，正是中國學生留日的高峰期，汪一駒曾統計列名於中國名人錄上的人物之教育背景，結果發現：1923年列名於各種名人錄的人物中，留日歸國學生佔 29.5%，居第一位；其次才是在國內受傳統教育者佔 27.3%；第三位是在國內現代學校畢業者佔 15.4%；第四位是留學美國者佔 12.9%。但到了民國 21（1932）年，則留美者躍登第一位佔 31.3%，留日者降為第二位佔 20.3%，在國內軍校出身者佔第三位（12.6%）。¹⁴1920年代的中國是人口快速增加，棉紡織業迅速成長，新聞媒體快速成長的新時代，¹⁵也是中日關係既密切而又極端緊張的年代。這是日本的大正時代（1912-1926），日本乘明治維新成功之後，睥睨亞洲，顧盼自雄，最鄙視中國的時代。¹⁶留日學生數量的驟變，主要是受到 1920 年日本侵略中國而爆發的九一八事變後的反日情緒之影響。

¹⁴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 177, Table 5. 中譯本：汪一駒著，梅寅生譯：《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臺北：久大文化出版社，1991年）。

¹⁵ 參考狹間直樹：〈國民革命の舞台としての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收入狹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頁 3-32。

¹⁶ 參考山根幸夫：《大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國のあいだ》（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

在徐復觀留學日本的年代裡，1930年的統計顯示：湖北籍的學生數佔當年所有中國留日學生總數的 4.4%，居於末位。湖北籍學生與當時佔第一位的廣東學生（佔 18.4%）與第二位的遼寧學生（佔 18.0%）數量相去甚遠。¹⁷但值得注意的是，徐復觀留學日本初習經濟，後轉軍事，都是當時中國亟須向日本學習之學門。在 1930 年這一年，中國留日學生所研習的學術領域，以社會科學佔 23.37%居第一位，其次是工程學門佔 10.79%居第二位，再次是軍事學 9.74%居第三位。¹⁸當時中國赴日留學生對研習學科之選擇，均為富國強兵，以救亡圖存為目標，青年徐復觀亦不例外。

徐復觀留學日本僅一年，民國 20（1931）年中日之間關係日趨緊張，7 月 2 日發生萬寶山慘案，9 月 18 日爆發九一八事變，9 月 23 日上海各校學生組織抗日救國聯合會，9 月 26 日在日本的中國十七省留日學生代表在東京的中華青年會集會，決議為抗議日本侵華，決定全體歸國，並要求中國駐日本公使支付旅費，留學歸國者數量可觀，10 月 8 日起中國留日學生監督發給部份學生歸國船票。¹⁹徐復觀在這一年因為抗議日本侵華而被捕入獄，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退學回國，結束留日生涯。青年徐復觀留學日本期間雖然只有一年，但卻使他由於掌握日文，而可以經由日文著作接觸西方現代文化與思潮，並且與當代日本學人建立友誼。他在 1951 年曾在「日華文化協會」演講，並與該會會長鶴見佑輔討論

¹⁷ Y. C. Wang, *op. cit.*, pp. 160-161.

¹⁸ Y. C. Wang, *op. cit.*, p. 512, Table 11.

¹⁹ 參考實藤惠秀著，譚汝謙等譯：前引書，頁 323，附錄二，〈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前表〉，1931 年條。

有關日本的問題。²⁰他自己在 1969 年 7 月 1 日（時年六十五歲）曾說：「我每年都要從日本買進日譯本的人文方面的著作」，²¹細加研讀，「想在日譯的西方典籍中，求得一點什麼」，²²早年的留日經驗確實對徐復觀影響甚深，在他的諸多時論中，既以日為師，將日本視為參考範例，又以日本之諍友自居，對當代日本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大加批判。在當代儒家學者中，徐復觀確因與日本之因緣而別樹一幟。徐復觀以日本文化作為參照系，思考中國文化的問題；也透過中國文化，而評論日本文化與社會的短長優劣。

三、徐復觀對日本的評論及其參考架構

（一）對日本的評論

徐復觀畢生的學思歷程與日本頗有關係，他早年留日接觸馬克斯思想，並通過河上肇接觸政治經濟學，一直到民國 41（1952）年還「把日譯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種，拿他摘抄一遍」。²³他評論本國文化或時勢時，也常將日本的情況比較觀之，²⁴也在諸多論著中一再提到日本學者或政治人物²⁵或著作²⁶

²⁰ 斯托噶（徐復觀筆名）：〈日本社會的再編成（上）〉，《華僑日報》，1951 年 6 月 26 日。

²¹ 徐復觀：〈人文方面的兩大障礙——以李霖燦先生一文為例〉，原刊於《中華雜誌》，收入《徐復觀文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96-205。

²² 徐復觀：〈西文化沒有陰影〉，收入《徐復觀雜文（三）·記所思》（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年），頁 59-66，引文頁 65。

²³ 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 311-319，引文見頁 317。

²⁴ 例如：徐復觀：〈成立中華文化復興節感言〉，收入《徐復觀文存》，頁 169-173；〈中日吸收外來文化之一比較〉，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

並加以評論，他與日本學者也常有書信往返。²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1950年訪問日本，舉目所見，滿目瘡痍，他有「回風今日向神山，霸業都隨劫火殘」²⁸的傷感。徐復觀在1960年4月2日再訪日本，賦詩「蓬島重來老學生，空虛何事苦追尋」。²⁹那麼，他「追尋」的結果如何呢？以下是我的分析。

徐復觀對於日本的評論，較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項：

1. 日本民族性格易趨極端，表現而為一種悲劇性的性格：

徐復觀認為「日本的民族性格，有許多地方是非常可愛的，而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可怕。這是一種矜持而向上的民族，但同時也是一個狂放而容易自趨毀滅」，³⁰從這項基本判斷出發，徐復觀對日本的社會、政治與知識份子都提出一些看法：

(1) 日本的社會生活中，人的感情未能適度舒發：徐復觀在1957年曾比較中日兩國民族性與社會生活說：³¹

頁 207-211。

²⁵ 參看本書附錄一。

²⁶ 參看本書附錄二。

²⁷ 參看本書附錄三。

²⁸ 徐復觀：〈東行雜感〉，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頁251-253，引詩頁252。

²⁹ 徐復觀：〈櫻花時節又逢君〉，原刊於《華僑日報》，1960年4月2日，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17-21，引詩見頁21。

³⁰ 徐復觀：〈日本民族性格雜談〉，收入《徐復觀文錄（四）·雜文》（臺北：寰宇書局，1971年），頁84-88，引文見頁85。

³¹ 徐復觀：〈從平劇與歌舞伎看中日兩國民族性〉，收入《政治與學術之間》，引文見270-271。

中國儒家重視禮樂，是要把人類內部的原始情感，合理的疏導，合理的發舒出來，即所謂「因人情而為之節」，使人的性與情一致，內與外一致，不在內心的深處，常藏著什麼不可測定的陰森之氣，使人能過一種天真的愷悌祥和的生活。〔……〕日本人對生活矜持敬畏之念，還沒有落實到和平樂易之中，於是日本人的感情深處，總藏著許多不願發舒，不敢發舒，或甚至不知發舒的小小深淵。深淵與深淵之間，各自斂抑，各成界劃，遂凝結成一種陰鬱的氣氛，感到隨處都應有所造作，都應有所戒備。由此愈積愈深，使他自己負擔不下，一旦爆發出來，便橫衝直撞，突破平時所謹守的一切籬藩而不可遏止。陰森與暴戾，只是一種感情狀態的兩面。

徐復觀敏銳地觀察到：中國社會中的人是以理化情，而在日本社會中人是理制情，因此，一旦爆發便不可遏止，這些都是日本民族性格易趨極端的一種表現。

（2）日本政客與知識份子都有「鋸齒型的心理習性」：早在戰後初期 1951 年 7 月 21 日徐復觀就引用一位日本人的話說：「在日本守不住日本」，徐復觀認為：日本人的性格不是對政治過分冷淡，就是過於衝動，對政治態度的變化也往往隨環境的影響，因此一旦韓國赤化，日本人會受很大的衝擊，也會加速赤化，因為多數經濟狀況不好的日本人會希望改變現狀。在美蘇對日的思想戰中，美國佔下風，日本反共氣氛較差，日本知識份子與公務員多處在灰色地帶，一旦受刺激難免偏左。徐復觀認為：吉田內閣的作風使社會不

滿³²；一旦朝鮮赤化，日本各地的共黨組織必迅速發展，這時日本會感到與其投靠美國，不如投靠蘇俄與中共。³³

徐復觀在 1951 年所提出悲觀的預測雖未成為事實，但是，他判定日本政治立場走向極端係根源於日本知識份子之「鋸齒狀的心理習性」這點，卻頗具慧識。1960 年 7 月 6 日在東京旅次中的徐復觀，對這項判斷提出進一步的分析，他說：³⁴

日本知識份子，因為自己想得太甜，算盤打得太如意，常常想利用各種國際關係，而又要能超出於各種國際關係責任之外，以建立獨自祥和快樂的天國；但事實上不盡能如此，於是日本知識份子的主觀想法，和客觀現實之間，永遠保持著很大的距離：既不肯接受現實，又不能反抗現實；更無法與現實取得融和，而只是不斷的與現實發生摩擦，[……] 因此，日本知識份子的心理，是鋸齒型的心理；他們看問題是通過鋸齒型去看問題；所以日本目前所走的路向是鋸齒型的路向。

扣緊日本這種「鋸齒型的心理」，徐復觀展望六十年代以後的日本局勢說：³⁵

³² 吉田茂(1878-1967)於1946年出任日本自由黨總裁，1948至1954年擔任首相，推動親美路線，決定戰後日本政治的主要路線。

³³ 徐復觀：〈在日本守不住日本〉，《華僑日報》，1951年7月21日。

³⁴ 徐復觀：〈鋸齒型的日本進路——東京旅行通訊之八〉，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66-70，引文見頁66。

³⁵ 徐復觀：〈對日本知識份子的期待〉，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71-75，

今日決定日本命運的，只有民主、或共產兩途，決沒有右翼的前途。戰前是左翼的天折，今後將是右翼的天折。這不僅是因為右翼缺乏足以抵抗左翼的組織力量，更重要的是，日本知識份子的兩極性，是沒有自主性的兩極性，他常要看著外面的風色而行事。戰前右翼的勝利，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有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可給日本知識份子以心理的暗示，及行動的模仿。現在可提供日本知識份子以心理暗示及行動模仿的，只有蘇聯與中共。所以希望以右翼的力量，以平衡左翼的力量的人，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徐復觀的敏銳之處，在於他能從現實政治的變化之中，看到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他的深刻之處也在於能從政治現實之中，看出文化的深層結構。

由於對於日本人的極端性格認識深刻，所以徐復觀在 1951 年 5 月 22 日對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的佔領政策頗為推崇，因為在他看來麥帥的政策遵從「民主主義偉大的中庸之道」。徐復觀認為盟軍總部的政策從排除極右主義到排除極左主義的轉變也並非不可思議。戰後初期，美國歡迎各國共同佔領，但蘇聯一定要佔領北海道而遭美國拒絕。初期的美國佔領政策係根據波茲坦宣言，以「根絕軍國主義，確立民主主義」為原則；在根絕軍國主義方面，在 1946 年佔領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已完成解除武裝，廢除兵役法等一切軍事制度。接著並以新憲法為中心，實行各項

民主改革。1945年10月麥帥發佈撤廢政治、民事、宗教等自由之限制的指令。11月提出「確保人權的五大改革」，婦女因此而獲得參政權，降低選舉與被選舉權的規定，釋放政治犯與思想犯。1946年11月3日，新憲法案制定，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確立了。為行憲及新體制的產生，成立皇室典範及廢除社會的身份制度，經濟上實施了農地改革。1947年8月26日，新的民主社會基礎已經建立完成。³⁶徐復觀認為，戰後初期盟軍佔領當局的政策是回歸「中庸之道」。

1960年11月日本民社黨在大選中挫折，徐復觀也歸因於日本的民族性易趨極端，所以走中立路線的民社黨不易獲選民支持。徐復觀認為，日本在戰後初期產生了左右分明的社會黨與自民黨，而兩者之間又產生了從左派分離出來，企圖化解對立的民主社會黨。然而民社黨所欲爭取的選票是勞工階級，因此在兩黨中都無法獲得支持。自民黨較能提出強有力經濟政策。日本所處的外交地位，非親蘇即親美，也早被兩黨佔先，因此造成了民社黨的灰暗挫敗。³⁷

(3) 日本政治中有暴力主義傾向：徐復觀認為易走向極端的日本民族性格，很容易孕育政治上的暴力主義。³⁸他對政治上的暴力主義撻伐不遺餘力。例如1972年3月他特別撰文報導在日本主張武裝暴力的團體，原來分為「赤軍派」

³⁶ 徐復觀：〈對日佔領政策的演變（上）〉，《華僑日報》1952年5月22日。

³⁷ 徐復觀：〈日本自民黨的挫折〉，《華僑日報》1960年11月29日。

³⁸ 徐復觀說：「日本的民主根器不深，日人性格的對極化，正是暴力主義的溫床。」見〈暴力主義的去路〉，收入《徐復觀雜文（三）·記所思》，頁247-250，引文見頁249。

及「京漢保安共鬥」兩個團體，1971年12月20日左右才組成統一的連合赤軍。聯合赤軍權力的最高機構，是七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二十七歲的永田洋子(1945-)出任副委員長。徐復觀認為，日本聯合赤軍的一連串的暴力行動，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和文化政治因素關連在一起的大問題。徐復觀指出，永田洋子這個殘暴女人原來是共立藥科大學非常用功而很純潔的學生，但是因為她抱持革命的主義與革命的思想而淪落至此。她相信她的主義與思想是至高無上的。她是組織的領導人，認為她自己是她所信仰的思想、主義的體現者，而忘掉她自己依然是一個有喜怒哀樂憎愛欲的人；於是認為自己的七情六慾的活動，就是自己所體現的主義與思想的活動。³⁹徐復觀特別提醒世人：「一切暴力主宰者，開始都有他言之成理的目標。但時間一久，暴力便使心理中毒，原來的目標，即被迷失掉，構成為『暴力而暴力』」。⁴⁰

綜上所述，徐復觀從日本民族性格的易趨極端，評論日本與知識份子多半具有「鋸齒型的心理」，分析日本人的情感過度壓抑未能發舒，指出日本民族性中潛藏政治的暴力主義傾向。凡此種種評論皆以他所瞭解的中國文化作為參考架構，這一點將於下節論述。

2. 日本社會與知識份子患有文化的「直腸症」：

徐復觀在1960年5月很敏銳地指出日本患有「文化直

³⁹ 徐復觀：〈在日本暴力主義的背後〉，收入《徐復觀雜文(二)·看世局》(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頁63-66。

⁴⁰ 徐復觀：〈「暴力世界中」的典型人物〉，收入《徐復觀雜文(二)·看世局》，頁22-25，引文見頁25。

腸症」。他指出，表面上看，日本對新鮮事物感受之快，對世界出版物翻譯之快，世界其他國家是少可比擬；但除了技術性的事物以外，在日本人生命的內層並不會有所改變，因此，日本有思想文化上的經紀人、攤販者；而沒有思想文化上的工廠。徐復觀從以上這項觀察出發，指出日本的知識份子患著直腸症。這種文化病症反映在語言的運用上，就是喜歡照外國音拼假名，表示自己認識外國字；而實際只是吃什麼便拉什麼的直腸症的最直接地表現。⁴¹徐復觀認為這種文化的「直腸症」使日本知識份子失掉了文化的消化力量，所以外面是七寶樓臺，而內心恐怕是一無所有，因此充滿了商人氣質。

因此，徐復觀進一步指出，日本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的介紹，雖然又多又快，但是，永遠停留在介紹階段，很少進一步吸收消化。這項文化的「直腸症」對日本的命運影響深遠，因為日本知識份子的性格，並不十分適合於培養日本的民主政治。日本知識份子對人的禮貌非常周到；但禮貌與他的心理實態，似乎有很大的距離。面對現實上的利害問題時，假若情勢並不向自己所希望的方面發展，心理實態便常要求突破禮貌的節制而訴之於力的解決；於是日本人常常不走向右的極端，即會走向左的極端，而離開了民主的中庸之道。就對外的關係說，日本知識份子的心理，也不容易保持平等相處的心理狀態。

徐復觀從日本的文化直腸症這項判定出發，對東京和京

⁴¹ 徐復觀：〈從「外來語」看知識份子的性格〉，收入《徐復觀文錄（四）·雜文》，頁24-34，引文見頁27-28。

都的文化生活均提出一針見血的看法：

(1) 東京：徐復觀認為東京人生活的特徵，第一是「忙」，愈重要的人愈忙，忙與不忙成為衡量一個人的份量的尺度。正因如此，有的人似乎並不太忙，但為了免得被人瞧不起，也得裝作忙的樣子。要裝作忙的樣子，便得找些可忙的事情；久而久之，就弄假成真，每一個人人都忙起來了。周圍的人都忙，偶或有一兩個閒人，也被旁人帶著忙。在大家真忙或假忙的生活中，即使是極好的朋友，若不事先約定，便不好去驚動他。驚動他以後，除了談談最現實而具體的事情以外，無法談學問上的問題。⁴²徐復觀認為東京生活的忙迫，正是日本的「文化直腸症」最鮮明的表現。

(2) 京都：徐復觀對京都推崇備至，認為京都的從容、寬紓、閒淡與守舊，與東京的忙迫、擁擠、喧擾與趨新，構成強烈對比，他稱京都為「日本的鎮魂劑」。⁴³

徐復觀在 1960 年 4 月初至 7 月 26 日第三度訪問日本，⁴⁴撰寫系列通訊，特重文化問題，顯示他敏銳的觀察力。他在 4 月 2 日的通訊中指出：日本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度，思想分裂尤其嚴重，都市與農村在意識型態上對立，知識份子與人民大眾斷裂為二，青少年與老年人代溝嚴重。他認為這種精神分裂正是現代性的特徵。東京的地下鐵裡擠在一起的人好

⁴² 徐復觀：〈日本的鎮魂劑——京都〉，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 46-50，尤其是頁 50。

⁴³ 同上書，尤其是頁 47。

⁴⁴ 在此次訪問所撰的第一篇報導〈櫻花時節又逢君〉於 1960 年 4 月 2 日刊於《華僑日報》，故他抵日必在 4 月 2 日之前。

像捆在一起的木柴，彼此沒有由生命所自然發出的互相關連的感覺。這也是現代文化的表現。⁴⁵

徐復觀對於東京所代表的現代文化頗為厭惡，但對京都的山川則流連忘返，對京都的學者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神田喜一郎（1897-1984）、重澤俊郎（1906-1990）、平岡武夫、宮崎市定（1901-1995）、木村英一（1906-1983）等都推崇備至，⁴⁶主要的原因是：「京都的學者，似乎對學對人，多一番真意，因之也多一番人情味。假定有的學問，是應當在平靜的氣氛中去研究，應當由根性穩定的人去研究，則京都大概在日本是最適合的環境了。」⁴⁷徐復觀在京都時答謝日本友人晚宴有詩云：⁴⁸

千萬人闌塵滾滾，願從閒處作商量。

很能將他對現代文化的鄙棄心情全盤托出。

以上整理徐復觀對日本的「文化的直腸症」的批評言論。在進一步分析徐復觀的思想立場之前，我必須說明：徐復觀對日本並非完全給予酷評，事實上他對日本人的優點也一再推崇，並取之而與中國人互作對比，例如徐復觀就推崇日本許多學人治學的勤懇、辛勞，鄙視政客，以學術之光來淨化人間的卑賤。這和中國許多人掛著學人、教授的招牌，拋棄自己的本業不做，卻匍匐在政客腳跟下吸吮污泥，兩者

⁴⁵ 徐復觀：〈櫻花時節又逢君〉，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17-21。

⁴⁶ 徐復觀：〈京都的山川人物〉，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51-65。

⁴⁷ 徐復觀：〈日本的鎮魂劑——京都〉，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46-50，引文見頁50。

⁴⁸ 同上註。

判若雲泥。徐復觀也指出日本人到處表現的是精密，而中國人到處表現的是疏闊；日本人到處表現的是周到，而中國人到處表現的是粗疏；日本人到處表現的是勤謹，而中國人到處表現的是懶散；日本人到處表現的是重知識，重藝術欣賞，而中國人到處表現的是攢門路，重食色沈湎。⁴⁹徐復觀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人既能盡量擴展世界史的知識，又能發揚日本每一角落的傳統文化，推崇備至，認為值得中國人學習。⁵⁰凡此都顯示徐復觀並不是一個偏狹的我族中心主義者，他針對日本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而提出的種種評論，顯然是以他的思想作為立論基礎的。

（二）參考架構

徐復觀撰寫關於日本的各種雜文或文化評論時，心中確有其鮮明的思想立場作為參考架構。這個思想的參考架構是通過徐復觀所理解的中國文化而建立的。質言之，徐復觀評論日本所依據的參考架構至少有二：

1. 中國文化中的中道精神：徐復觀在諸多論著中一再強調，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中最偉大的智慧就是中庸之道。⁵¹徐復觀指出，中國的文化是一個典型的平原闊野的農業文化，其特點便是博大和平，反映在政治思想上，就是比西方更為確定深入的中道精神。中國正統的政治思想，總不外「平」、

⁴⁹ 徐復觀：〈「人」的日本〉，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 80-84，引文見頁 82-83。

⁵⁰ 徐復觀：〈成立中國文化復興節感言〉，收入《徐復觀文存》，頁 169-173。

⁵¹ 徐復觀：〈在歷史教訓中開闢中庸之道〉，收入《徐復觀文錄（一）·文化》（臺北：寰宇書局，1971 年），頁 178-181。

「均」二字。「平」與「均」二字都是從「中」字來的。⁵²在1949年大陸政權易幟之時，徐復觀痛定思痛，反省歷史變局之所由來，他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中許多黨員失掉了理想的「中庸」性格，一步一步地走向歷史的另一極端，也就是「人欲」，因此激起了另一極端的勢力共產黨的崛起。由抗戰所激發的知識份子的團結，因為共黨的陰謀與國民黨人的愚蠢，未能凝結成為一條中庸的路線，致使知識份子的團結完全歸於幻滅；而國民黨面對有異見的知識份子，已完全失掉了涵容與討論的精神。國民黨到了臺灣以後實行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是臺灣的土地改革，但是國民黨的許多黨員，並不曾把自己的精神與土地改革融鑄在一起。徐復觀認為，從抗戰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所應當傳承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的中庸之道的理想，曾因緣抗戰的機會而有短短的一場春夢，以後便在兩極化之中而身不自主地被人擺弄，因此導致中庸之道的徹底破滅。徐復觀預期，未來中國命運的復甦，必寄託在中庸之道的復甦之上。⁵³

徐復觀不僅以「中庸之道」追溯近代中國歷史悲劇之所由來，也從「中庸之道」這個思想立場出發，衡斷日本的民族性格與知識份子的心理，從而指出日本的民族性易趨極端，日本人過度壓抑個人情感，日本知識份子常有「鋸齒型的心理」等現象。因為徐復觀是從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

⁵² 徐復觀：〈論政治的主流——從「中」的政治路線看歷史的發展〉，原刊於《民主評論》第1卷第2期（1949年7月1日），後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頁1-12。

⁵³ 徐復觀：〈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頁263-277。

論日本及戰後世界局勢，所以他對麥克阿瑟佔領日本的政策先排除戰時遺留下來的極右主義，再排除戰後的極左主義，頗為推崇，認為符合民主主義的中庸之道。⁵⁴他對日本赤軍聯的暴力主義痛加撻伐，⁵⁵就是因為這種暴力主義偏離「中庸之道」的正軌。

如果我們再問：為什麼徐復觀對於作為政治路線的「中庸之道」如此堅持並以此來看世局？除了如他自己所說「中」的路線是歷史上政治的主流之外，⁵⁶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對人民的具體生活福祉的強烈關心。

徐復觀一再肯定，中國文化是在具體生命上立腳的文化，是在具體生命與具體生命之間直接晤面的文化，所以中國文化中的「理」、「道」、「心」、「性」等概念，都立基於具體生命之上，以具體生命的自我完成為目的；而決不以抽象概念來代替具體生命自我完成的目的，那些由狂信狂熱而走入殘酷吸血的路上的人，當自己倒了下來而可以冷靜反省一番的時候，一定會發現他們所狂熱狂信的，只不過是一場惡夢。⁵⁷徐復觀認為，具體實踐應先於抽象觀念，否則會造成觀念的災害。徐復觀在 1981 年 3 月 11 日七十八高齡時說：⁵⁸

⁵⁴ 同上書，頁 32。

⁵⁵ 同上書，頁 35。

⁵⁶ 同上書，頁 50。

⁵⁷ 徐復觀：〈在日本暴力主義的背後〉，收入《徐復觀雜文（二）·看世局》，頁 63-66。

⁵⁸ 徐復觀：〈實踐體系與思辯體系——答某君〉，收入《徐復觀最後雜文集》（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 年），頁 25-28，引文見頁 28。

人的歷史實踐，不是順著邏輯推理的直線前進的，其中有許多限制，有許多曲折。也不是順著邏輯推理的必然性前進的，其中有許多偶然，有許多調和妥協。因此，不僅馬列主義的思辯體系，在實踐中會造成中國乃至人類莫大的災害，假若順著康有為的大同思想，順著熊十力先生晚年的《乾坤演〔按：「演」應作「衍」〕》哲學，以及方東美先生縹緲地形上學，付之於政治實踐，也必然形成政治的獨裁，造成人類的災害。凡是喜愛形上學的人，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格。把他們限制在純學術範疇之內，或可形成某種異彩，但決不能轉用到政治實踐上去。

這段話確是徐復觀晚年定論，他終其一生持論一貫，並且認為這是孔子思想的根本性格。他說：「孔子思想的合理性，不是形式邏輯的合理性，而是具體生命中的理性所展現的合理性。孔子思想的統一，是由具體生命理性的展開、昇華的統一；展開、昇華中的層級性，即是孔子思想的系統性。這不是邏輯推理的線狀系統，而是活躍著生命的立體系統。」⁵⁹徐復觀心目中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有兩大特質：(1) 具體性；(2) 社會取向。⁶⁰這兩大特質均在人民的實際生活中落實。我們可以說，徐復觀所要求的是「邏輯的」從屬於「歷史的」，並且落實在歷史性（也就是具體性）之上。

由於將人民生活置於第一位，所以徐復觀對國際政治與

⁵⁹ 徐復觀：〈向孔子的思想性格的回歸〉，收入《徐復觀雜文續集》（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1年），頁65-76，引文見頁75。

⁶⁰ 參看本書第三章。

日本的評論，都是扣緊「人民主體性」著眼。舉例言之，1951年8月4日，徐復觀在一篇題為〈日本向天國的悲訴〉的報導中，就為日本人民伸張正義。所謂「天國」是指克里姆林宮所支配的蘇俄，「日本向天國的悲訴」是針對戰俘遣返的問題。1951年7月23日，日本全國留守家族在共立講堂召開代表大會，對於留在蘇俄及中共的丈夫與爸爸，討問確實下落。這些家族成員更分批向盟總及日本首相請願，日本首相近乎官僚的答覆，引起一陣痛罵。徐復觀對這些戰爭受害者深表同情。⁶¹1974年日本第卅屆參院選舉結果，自民黨慘敗，徐復觀評論這次選舉，認為這項結果顯示人民的現實生活戰勝了政治體制，人民的人格尊嚴戰勝了財閥與金錢的勢力。自民黨的競選口號是「守護自由社會，使生活內容豐富」，自民黨提出這項口號原因是為了奪回自民黨已失掉了的大都市的控制權；其次是深知多數市民不希望社會體制激烈改變；第三則是因為自民黨的經濟高度成長的政策，不能解決通貨膨脹及物價高漲的問題，於是藉由口號以掩飾問題。但是選舉結果是，自民黨由原來的134席變為126席。徐復觀認為自民黨失敗的主因，乃是因為忽略了通貨與物價的人民現實生活問題。⁶²

2. 中國文化發展受到阻滯，患有文化的便秘症：徐復觀評論日本患有文化的直腸症，這項觀察其實是以他對中國病痛的診斷作為參考架構的。

⁶¹ 徐復觀：〈日本向天國的悲訴〉，《華僑日報》，1951年8月4日。

⁶² 徐復觀：〈日本十屆參院選舉所顯示的意義〉，《華僑日報》，1974年7月17日。

徐復觀解釋下的中國文化圖像包含以下三項要義：(1) 中國文化中的政治傳統以專制政體為其主要特徵，以「君主主體性」為其本質，對農村社會壓榨，並扭曲先秦儒家政治理想；(2) 中國文化中的社會以農村為其特質，中國文化之精神具體表現在農民生活之中；(3) 中國文化中的思想主流是以經世濟民為取向的儒家思想，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地與專制政體進行戰鬥。⁶³徐復觀在諸多論著中一再指出，儒家思想在歷史上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根據；而在觀念上也已突破了專制政治，但卻又被專制政治所壓制，以致儒家以人格為基礎的人文主義，沒有完全客觀的建構，所以僅能緩和專制政治而不能解決專制政治的病灶。⁶⁴因此，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文化精神未能舒展，因而患了文化的便秘症。徐復觀宣稱，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從學術上把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從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政治，確切的分開；使許多叔孫通、公孫弘的子孫們，無法隱藏其卑污的面目」。⁶⁵

徐復觀認為，中國在歷史上也吸收外來文化（如佛教），鴉片戰爭以後也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以追求富國強兵。但是從乾嘉時代開始，除了在故紙堆中去弄點訓詁考據之外，文化的創造活動開始凍結；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連主張全

⁶³ 參看本書第3章，並參考 Chun-chieh Huang, "A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t's Postwar Taiwan Experience: The Case of Hsu Fu-Kuan (1902-1982)," in Chun-chieh Huang, *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1895-2005*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 pp. 127-150.

⁶⁴ 徐復觀，〈儒家對中國歷史命運掙扎之一例〉，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331-395，尤其是頁 394-395。

⁶⁵ 徐復觀，〈三十年來中國的文化思想問題〉，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423-438，引文見頁 429。

盤西化的人，也始終是毫無成績。近百年來，中國人在文化上處於既不能創造又不能吸收的空虛狀態之中。⁶⁶徐復觀對清代乾嘉考據之學不能掩其厭惡之情，他認為乾嘉考據傳統正是近代中國文化便秘症之學術根源。

在上述參考架構對照之下，徐復觀一針見血地看出日本吸收外來文化極其快速，正與中國構成對比。但是，他認為日本知識份子由於具有強烈的商人氣質，所以對外來文化未能加以深刻地消化，以至於出現所謂「文化的直腸症」。

四、徐復觀的日本評論之特殊性：與當時新聞媒體意見的比較

現在，我們進一步將徐復觀對日本的評論，與當時新聞媒體對日本的報導及意見互作比較，以彰顯徐復觀的日本評論之特殊性。我在這一節裡想提出的看法是：（1）徐復觀評論日本的社會政治等新聞事件時，特別重視事件所從出的「結構」或「脈絡」；（2）徐復觀對日本社會黨的發展特別重視。以上這兩點都與徐復觀的思想傾向有深刻關係。

（1）徐復觀評論日本，特重事件的「脈絡性」：徐復觀評論日本的各種事件，與當時新聞界最大的差異之處是，徐復觀分析事件常注意事件背後的社會、心理及文化的脈絡，並將個別事件置於整體歷史結構之中考慮。我們舉二例加以說明。

⁶⁶ 徐復觀：〈中日吸收外來文化之一比較〉，收入《徐復觀文錄選粹》，頁207-211，引文見209。

第一個例子是 1951 年初，何應欽（敬之，1890-1980）訪問日本，獲得日本朝野人士熱烈的歡迎，中外新聞媒體都大幅報導，徐復觀在《華僑日報》撰文報導此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徐復觀認為：何應欽訪問日本，上至親王首相、元老名流，在形式上及情緒上都給何應欽最大的敬意。何氏能獲得敬意，是因日本希冀中國的情感所引發，但這不能歸於個人，而應歸咎於偉大的民族背景。韓國對日本仇恨至深，日韓未來的關係是悲觀的。中國內地與臺灣所受殘酷暴行不下韓國，但中國文化的偉大在於常把中國人的感情，在緊要關頭上，從直接利害中推擴出去，從仇恨中轉出人類真正的愛，這便是中國五千年來不斷凝結融合、衰竭而不滅亡的真正原因。徐復觀認為，現今日本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卻走上考據之學，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卻愈離愈遠。今日日本人士除對中日關係必須有反省外，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反省。中日關係將從何應欽將軍來日所擁有的友情，建立起新的基礎。⁶⁷總而言之，徐復觀認為，何應欽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歡迎，乃是由於中國文化中的恕道及其所激發的日本人對中國的感念之情。

相對於徐復觀的評論，當時臺灣最重要的新聞刊物《新聞天地》的評論，就顯得失之膚淺，僅注意何應欽訪日的現實意義而未及其文化背景。《新聞天地》在一篇題為〈何應欽受誰歡迎？〉的報導中強調，何應欽訪日從中日之間的國民外交活動論，對自由民主的中國和世界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他來日本後所呼籲的太平洋反共同盟，雖然因臺灣局勢

⁶⁷ 徐復觀：〈何應欽在日本〉，《華僑日報》，1951年5月4日。

微妙而難為民主陣營正式接受，但是類似的組織已經在逐漸醞釀形成之中。同時，在中日兩國之間，更增加了日本人「靠攏」臺灣，支持自由中國的意志和力量。⁶⁸《新聞天地》對何應欽訪日所受歡迎的報導，完全未涉及其文化問題。

到底何應欽訪日所受到的熱烈歡迎應如何理解呢？當事人何應欽自己的思考是：⁶⁹

首先使我印象最為深切的，便是日本民族，到今仍富於東方文化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和完全以功利主義為基底的西方社會比較，總覺得人與人之間，容易有更好的接觸。中國的人情味，表現於尋常間人對人的平淡深厚之情；而日本的人情味，則表現於對某種德惠的熱烈的感激之意。日本人過去對於他的天皇的無限度敬，以及麥帥離日時所出現的令人感動的場面，都是這種人情味的表現。中國遭遇空前變局，政府退處臺灣；但我這次以私人資格來日，發現日本人對於投降時蔣總統「以德報怨」的廣播，至今依然感念不忘；而對本人執行受降政策，盡量與一百四十萬日本人以歸國便利的這一點，也到處受到親切的反應。

何應欽從東方文化中的人情味，思考他自己的訪日之旅，正與徐復觀的看法桴鼓相應，比較能夠深入掌握這個事件

⁶⁸ 余勵余：〈何應欽受誰歡迎？〉，《新聞天地》，民國 40（1951）年 3 月 2 日，第 161 期，第 7 年 11 號，頁 8。

⁶⁹ 何應欽：〈旅日觀感〉，《新聞天地》，民國 40（1951）年 6 月 19 日，第 174 期，第 7 年第 24 號，頁 4。

的核心。

第二個例子是徐復觀對 1951 年日本社會的觀察。1951 年日本社會「追放」19 萬人，抽掉了日本社會各界的中心人物，由「戰後派」承擔起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責任。這次被「追放」的人物以保守派居大多數，並以自由黨為大本營。因此，1951 年日本社會的再編成也就等同於自由黨的再編成，而歸結到自由黨內鳩山一郎（1883-1959）與吉田茂的權力爭奪。徐復觀分析這件事件的發展，指出這件事除了代表戰前派與戰後派的消長之外，也對日本的經濟重大影響，並對文化界產生重大衝擊，使出版界、言論界及學術界均為新人所領導，這些新人容易與左派相結合，有助於日本人極端性格的發展。⁷⁰

與徐復觀的評論相對照之下，當時傳播媒體對於這件事的評論完全著眼於政治權力鬥爭。例如《新聞天地》的報導就指出，日本自由黨的鳩山為了整肅，和吉田做了一次黑市交易，將自由黨總裁寶座移讓吉田，他們兩人對自由黨的爭奪的發展，將決定日本政治的演變。⁷¹《新聞天地》的報導僅從權力鬥爭著眼，與徐復觀注意這個事件在文化、經濟、學術影響很不相同。

徐復觀在評論日本的社會與政治事件時，常常將這些時事置於社會、政治、經濟交互作用的脈絡中加以分析，從而彰顯這些時事的「脈絡性」。徐復觀的思想史研究論著，常

⁷⁰ 徐復觀：〈日本社會的再編成〉，《華僑日報》，1951 年 6 月 26-27 日。

⁷¹ 林之助：〈鳩山吉田爭奪自由黨〉，《新聞天地》，民國 40（1951）年 4 月 17 日，第 165 期，第 7 年 15 號，頁 19。

常強調在具體而特殊的整體歷史背景中，思考思想史上的觀念的意義。徐復觀一直努力於把思想或觀念加以「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⁷²這種思想傾向，使徐復觀在評論日本時事時，與當時媒體的言論有深淺之別。除了上舉對何應欽訪日以及日本自由黨之再編成的看法之外，徐復觀在 1972 分析日本與中共建交問題，指出關鍵在於經濟因素，日本與中共建交顯示政治原則服膺於經濟原則。但新聞界對這件事的報導則不免流於謾罵，未能針對日本何以要與中共建交進行深層分析。⁷³1972 年關於三島由紀夫(1925-1970)事件，徐復觀與新聞媒體的報導都認為三島事件與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無關。徐復觀欣賞三島案件中，日本司法的獨立與尊嚴，⁷⁴一如他欣賞調查吉田內閣的金錢醜聞案過程中所表現的司法獨立，但新聞界對這些事件背後的意義則無著墨。⁷⁵再如 1974 年關於田中內閣因醜聞而倒閣的事件，徐復觀從這件政治事件注意到日本司法獨立與尊嚴之問題，也注意到政客道德低落影響民主政治發展的現象。這都是當時新聞界討論同一事件時未觸及的論點。⁷⁶

⁷² 參看本書第二章。

⁷³ 徐復觀：〈成為中(中共)日關係正常化槓桿的經濟問題〉，《華僑日報》，1972 年 10 月 11 日；徐復觀：〈日本對中共的複雜心理〉，《華僑日報》，1973 年 5 月 8 日；孫爰：〈日毛勾搭有了草案〉，《新聞天地》，民國 61(1972)年 9 月 30 日，第 1285 期，第 28 年 40 號，頁 11。

⁷⁴ 徐復觀：〈日本三島由紀夫案件的判決〉，收入《徐復觀雜文(二)·看世局》，頁 71-75；成荷生：〈三島由紀夫蓋棺論定〉，《新聞天地》，民國 60(1971)年 3 月 13 日，第 1204 期，第 27 年 10 號，頁 19。

⁷⁵ 徐復觀：〈從貪污事件看日本政治〉，《華僑日報》，1954 年 3 月 4 日。

⁷⁶ 徐復觀：〈日本政局在黑霧中〉，《華僑日報》，1976 年 4 月 6 日；徐復觀：〈迷失了的日本自民黨〉，《華僑日報》，1976 年 9 月 8 日；徐

(2) 徐復觀評論日本政情，對社會黨特加注意：早在 1951 年 8 月，徐復觀就報導日本社會黨委員長鈴木茂三郎（1893-1970）赴巴黎出席世界社會主義者的國際會議，發現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為了抵抗蘇聯的極權勢力，都一致主張增強軍備，鞏固民主國家的陣營，分明和日本社會黨的講和三原則格格不入。鈴木雖然無功而返，但依然宣稱講和三原則不變。徐復觀訪問了社會黨右派首領西尾末廣，西尾認為講和三原則不會改變，即使勞動組合不幸分裂，其勢力也不會全落至左派手中，勞工陣營會隨之分裂，勢力平分，隨後右派加強。現今雖勞動運動都在共產黨手上，但實際上贊成講和的人佔多數。西尾認為社會黨右派在理論上絕對反對列寧與史達林主義，但對馬克思主義則採批判態度。他詢問徐復觀，東方文化中有何精神力量。徐復觀告訴西尾，佛教在現實之外去實現人生的無我價值，而儒家卻在生活中來實現無我的價值，儒家較為實際。⁷⁷

徐復觀對日本社會黨懷有深切期待，他認為日本民族具有易趨極端而又富於投機性的性格。從 1972 年年底三十三屆總選，自民黨未達到預期目標，社會黨小有收穫，民社、公明兩黨慘敗，日共則得到空前的勝利以來，日本的政治分野又投到極端與投機兩相結合的動盪裡面。徐復觀分析 1973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的社會黨大會，指出社會黨自成立以來，

復觀：〈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略評日本田中政權的短命〉，收入氏著：《徐復觀雜文（二）·看世局》，頁 89-93；李中興：〈田中因五千萬元丟官〉，《新聞天地》，民國 64（1975）年 3 月 18 日，第 1413 期，第 31 年 11 號，頁 7。

⁷⁷ 徐復觀：〈日本社會黨的一斷面〉，《華僑日報》，1951 年 8 月 23 日。

因為是「觀念革命論者」的大結合，內部始終鬧著左右的對立，糾纏不清。因為黨內的左翼勢力提出了反共，右翼及不左不右的當然更反共。在反共的一致點上，成田、石喬（書記長）所提出的議案，都沒有爭論地通過。但社會黨自身弱點甚多，不是反共便可以健全的。更重要的是：社會黨的一切用心，也和公明黨一樣，只在黨自身的利害上作揣摩工夫；由這種揣摩工夫所得出的結論，本質上不能脫出「政客投機」的範圍。日本社會黨真正的出路，不僅應把黨的利害屈退到第二位，並且應當把白領階級腦筋中從書本上得來的一套一套的觀念完全放下，從日本的實況看出日本的前途，在對地上的（不是觀念的）日本前途的把握中，建立黨的基礎，樹立黨的方向與作風。這比坐在觀念的椅子上，左右張皇，或者更有前途。⁷⁸徐復觀將日本社會黨置於日本人的極端性格的脈絡中分析，但對社會黨又有所期待，所以 1976 年當日本社會黨理論家宣稱日本社會黨是馬列主義的政黨時，徐復觀難掩其失望之情，他指出日本社會黨說社會黨是馬列主義的政黨，即是承認社會黨是屬於某種「概念」的政黨。日本社會黨左派的大腦，實由教條主義的中毒，以致陷於麻痺狀態，只能作書本上的概念的直接反應了。⁷⁹徐復觀對日本社會黨的期待與批判，皆與他青年時代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有深刻關係。

相對於徐復觀對社會黨的特感興趣，新聞界對日本政黨

⁷⁸ 徐復觀：〈日本社會黨的前途〉，收入《徐復觀雜文（二）·看世局》，頁 81-84。

⁷⁹ 徐復觀：〈日本社會黨左派的「大腦麻痺症」〉，收入《徐復觀雜文（二）·看世局》，頁 98-102。

政治的分析就顯得只及其事件本身而未觸及事件背後的意義。例如對於 1951 年日本全國市、區、町大選中，以自由黨為中心的保守勢力，獲得壓倒的優勢，而社會黨革新系大為衰退。新聞界只關心選舉結果而未分析此種結果之文化或心理因素。⁸⁰

總結本節所說，徐復觀對日本的評論處處顯示他的思想傾向。他常將現象置於整體性的脈絡中考量，所以他評論日本的政情常能從簡單的時事中看出複雜的脈絡性或結構性因素。其次，徐復觀對日本社會黨的特感興趣，與他青年時代對社會主義的憧憬有其深刻關係。這兩項特點都使徐復觀與當時新聞性的意見頗不相同而突顯他的特殊性。

五、結論

本章探討徐復觀對日本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評論，以觀察當代儒學與日本的互動。整體而言，徐復觀認為日本民族性格易趨極端，日本患有所謂「文化直腸症」，他這兩項判斷都以他對中國文化的「中道」精神的推崇以及對清代以降中國學術的批判，作為參考架構。將徐復觀的日本評論與當時傳播媒體的日本評論作一比較，就發現徐復觀的評論頗有其特殊性。徐復觀評論日本政情時特別注意事件的脈絡性，所以他常在事實中看出複雜的涵義，這與他常將人物或事件置於脈絡中考察的思想傾向頗有關係。而且，青年徐復觀對社

⁸⁰ 和田一郎：〈保守派壓倒勝利〉，《新聞天地》，民國 50（1961）年 5 月 15 日，第 169 期，第 7 年第 9 號，頁 10。

會主義的憧憬，也使他日後評論日本政情時特別關心日本社會黨的發展而有所期待與批判。除了對日本文化與社會的評論之外，徐復觀對日本侵華、臺灣人受日本人殖民的痛苦，以及對光復後國府在經濟上對日本過度依賴，也有痛切的批判。

從徐復觀對日本的評論這個個案，我們看到：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例如徐復觀）基本上是透過他們所瞭解的中國文化以觀察世界（例如日本），他們這種觀察並解釋世界的方式，使他們別具慧眼，見人之所未見。但也由於他們是以中國文化作為參考架構以分析世界，所以他們長處所及不免短亦伏焉，他們對於不與（他們所認知的）中國文化產生對比或參照作用的世界現象，就不免有所忽略。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認識並解釋世界的方式，實在是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